



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



新

散文选集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百花散文书系

当代部分

主编

徐柏容

郑法清

靳

以  
散

章洁思 编

文  
选集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靳以散文选集/靳以著;章洁思编.—2版.—天津:  
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4  
(百花散文书系.当代散文丛书)  
ISBN 7-5306-1405-3

I.靳... II.①靳...②章...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  
中国—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9622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米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875 字数 150 千字

2004 年 9 月第 2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 定价:25.00 元

## 编辑例言

一、本套“当代散文丛书”是“百花散文书系”的一个组成部分。选收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散文家的名篇佳作，按人专集分册。

二、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，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。

三、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，简单介绍作者生平，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，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。

四、所选作品，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；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。

## 序 言

蒋孔阳

靳以，原名章方叙，天津人，1909年生。父亲章鹤汀，长年在东北做五金生意。他跟随父亲，童年生活大多在东北消磨。母亲章靳氏，是一位没有文化、但却具备一切善良品德的中国老式妇女。靳以与母亲的感情特别好。根据其女洁思同志的记载：“他小说中不少母亲的原型都取之于她。笔名‘靳以’中的‘靳’字，即随母姓。”到了十二岁，他回到天津，和祖母生活在一道。祖母乐善好施的性格，给了他很大的影响。

小时候，他就喜欢读小说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等书，虽然字还认不全，加上父亲的禁止和

责骂，但他还是偷偷地读，“贪婪地躲在屋角读”。洁思同志在《靳以传略》中，给我们转述了一个故事：“进了小学，借来一部《西游记》，因为藏藏躲躲搞丢了一本，挨了一顿打，半个月不吃点心，才从父亲手里要来钱买部新的归还学校；可是这缺掉一本的《西游记》却成为我的无价之宝。我把它藏在枕头下、棉被里，翻来复去把一部书看烂了还舍不得丢。”可见他是怎样从小就喜爱读小说了。

中学他读的是南开中学。根据他自己的讲法，他是从中学开始喜爱文学的。在《从个人到众人》一文中，他说：“喜爱文学是从中学就开始了的，那是由于我的一位先生的教导，看我有一点写作的能力，也喜欢阅读，于是我就算是跨上了文学的道路。”

大学他读的是复旦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。但是，他不喜欢这个学科，他喜欢的是文学。他开始写作，开始投稿。他描写当时的情形说：

开始写作是在大学二年级。我的文学创作行径也是从感情出发的，因之首先我写诗，

自以为是一个诗人。但是我并不愿意被别人叫做诗人，甚至于也不愿意使别人知道，我总是深夜里一个人偷偷地写，写好就藏在自己的枕下，第二天再偷偷地取出来看。不知道是怎么一股力量使我竟想到寄出去，我就想了一个假名字，偷偷地寄出去了。这一切都好像见不得人的，不知是幸运或是不幸运，居然被编者采用，印在刊物上，让那见不得人的作品和许多读者见面。当时也不知是喜是忧，总觉得有点不平常的感觉在胸中澎湃起伏，而这说不出道不出的复杂感情形成了一股力量，把我猛地推向文学的大道。（《从个人到众人》）

就这样，靳以走向了文学的道路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。从1929年到1959年，三十年中，他写了大量的作品，出版了将近四十个集子。他写过诗、报告文学、散文和小说，但最多的是散文和小说。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圣型》，1933年由上海复兴书局出版。在《序》当中，他说：“当我自身在最得意之中，也没有把人生看得如何好，

静下心来的时候，总有那淡淡的阴影，在我的眼前。”这种情绪和调子，差不多笼罩在靳以解放前的早期作品中，那就是忧郁和愤懑。此后二年，他又出版了四个短篇小说集：《群鸦》、《春的花》、《虫蚀》和《珠落集》。1936年，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残阳》、《黄沙》和中篇《秋花》。对于《黄沙》，靳以在《后记》中说：“对于这本书我有一点小小的偏爱，因为它帮助我永远记着活在这世界上不幸的人们。”这一年，鲁迅逝世，他在上海，和巴金等八名文学青年，一同把灵柩抬进柩车，抬进墓穴。当时，他意识到：“从此以后我的肩膀上就总像负了一个重担，我时常提醒我自己，必须小心地迈步，走一条正路，不是为自己，为了和我一同负载重担的人，为了随在我们身后的比我们年青的人。”

1937年，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远天的冰雪》、《靳以短篇小说一集》，以及散文集《猫与短筒》、《渡家》。1938年，出版了三本书：《我们的血》、《我的家乡》和《火花》。然后，在辗转香港绕道重庆的途中，他开始构思并写作《人世百图》。在《后记》中，他说：“一心一意想描画人的

嘴脸，不提防却写了许多禽兽。”可见他愤懑之深了。1940年，出版了《雾及其它》。1941年，出版了两个短篇集：《洪流》和《遥远的城》。1942年，出版了散文集《红烛》。靳以一生中唯一的长篇《前夕》，也是这年出版的。《前夕》描写抗战的前夕，一个大家庭里各个成员的表现，召唤人们投入抗战的滚滚洪流。这部长篇，前后共写了三年。

1944—1946这三年当中，他一边教书，一边写作，一边还着手翻译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助夫兄弟》。这几年，他一共出版了五个集子：《众神》、《沉默的果实》、《鸟树小集》、《血与火花》和中篇小说《春草》。

日本投降后，他随复旦回到了上海，参加了大学教授联谊会，积极投入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等一系列运动。同时，他没有忘记写作。1948年，他出版了三个集子：《人世百图》、《黑影》及《生存》。

二十年来，他走着艰难的但是一直在奋勇前进的道路。解放以后，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之外，仍然在努力地写作。1952年，他写成了战地

访问集：《祖国——我的母亲》，同时出版了《光荣人家》。1954年，出版了《靳以散文小说集》。1954年，出版了《佛子岭的曙光》。1955年，出版了《过去的脚印》。1956年，出版了《向〈茹尔宾〉一家学习》、《工作、学习与斗争》。另外，还出版了散文集《江山万里》。他逝世的一年，1959年，出版了他最后的一个集子：《幸福的日子》。他逝世后，他的生前友好又替他编辑了一个他的集子，由巴金取名为《热情的赞歌》。

靳以同志的这些著作，他去世后，他的女儿章洁思，曾经加以编选，出版了《靳以选集》五卷本、《靳以文集》二卷本、《靳以散文小说集》二卷本。香港方面，还出版了《靳以散文集》、《靳以小说集》、《靳以选集》等。靳以的一生，是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一生。三十年来，他一直在写作，不断地写作。他无愧于“作家”的称号。他的女儿洁思同志说：

他说过：“即使我是一只飞蛾，我早该奋不顾身投向火焰。”这句话正是靳以一生的写照。对于文学事业，他正像飞蛾扑火，奋不顾身。

然而，靳以的文学事业，决不限于写作。他还同时是文学编辑和文学教师。他在编辑和教学方面，同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1933年，他就和郑振铎一道，主编大型刊物《文学季刊》，次年又办了一个附属月刊《水星》。参加编委会的有郑振铎、巴金、沈从文、李健吾、靳以和卞之琳。卞之琳在《星水微茫忆〈水星〉》一文中说：“靳以挑了大小两刊一个编辑部的重担，还能照常从事他自己的文学创作。”1936年，来到上海，他又接受赵家璧的邀请，与巴金共同主编大型文学刊物《文学季刊》。《文季》被查封后，他又和巴金主编了《文丛》。巴金在《他明明还活着》一文中说：

我的笔只好停留在靳以的编辑工作上面。在他的将近三十年的文学活动中，这个工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他把大部分精力花在这个工作上，他的确是一个杰出的文学编辑工作者。从一九三三年起，他接连编辑了十种以上进步的大型期刊和文艺附刊，通过这些有独特风格的刊物，团结了很多优秀

的作者，为新文学事业培养了不少的新人。

“八·一三”的炮声把他推向抗战的洪流。大的刊物不能出，他就出小刊物《呐喊》。后来《呐喊》遭到巡捕房的查禁，他就改名《烽火》继续出版。抗战中，他到了重庆。他编辑了《国民公报》的副刊《文群》，前后四年。1941年，他到了福建，接编《现代文艺》，并创刊了《文艺丛刊》。日本投降后，他又编辑了《大公报》的《星期文艺》。解放后，他编辑过《小说月刊》、《新中国文艺丛书》等。1957年，他和巴金受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委托，创办了大型文艺刊物《收获》。巴金在《写在〈收获〉创刊三十年》一文中，回忆到靳以时说：“不管有多少干扰，他坚持着把全部心血花费在刊物上，勤奋的工作促使他过早接近死亡，但是他亲身浇灌的花开放了。”根据彭新琪在《忆靳以师》一文中的回忆，靳以在当编辑时，还树立了一些良好的作风。如经常与作家联系，“不妄改作家的作品”，并经常与各个编辑讨论稿子等。

此外，文学教育工作，也是靳以文学生活中重要的一个方面。1938年，他到了重庆，生活无着。

这样，他只好到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文学。开始，他只是为了谋生；哪知到了复旦以后，却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在《从个人到众人》一文中，他说：

在我的生命中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，使我从一个人，投身到众人之中，和众人结合成一体了。

对于他这时的思想情况，洁思同志在《靳以传略》中，曾这样加以叙述：

因为在学校里他有很多青年接近的机会，因而受到他们的影响。他热爱同他朝夕相处的学生，热爱年青人追求的光明，他勇敢地同年青人站在一起跟反动势力作斗争。他坚决拒绝学校中的反动首脑要他宣誓“不把学生引入歧途，效忠党国”的命令，因为他说：“我决不是出卖灵魂的人，我更不能辜负和我亲近的青年们，如果我向恶势力低头，我怎么还能坦然地站在他们的前面。”他还被请

作“抗战文艺习作会”和“读书会”(均由党领导)的指导教师,于是这一切就引起如此结果:时常得到特务分子的警告和监视。皖南事变后,在他的12名学生中,10名离校,且有的去了延安之后,他就以“思想问题”的名义被伪教育部明令解聘。

解聘以后,他转到福建永安福建师专任教。1944年,他又回到复旦大学。日本投降后,他随着复旦回到了上海,更加积极勇敢地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。解放后,他一度被调到沪江大学担任教务长和工会主席。1952年10月,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团。1953年,调入华东文联,担任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,后改为上海分会副主席。1954年,到佛子岭水库工地,以及祖国各个地方参观,抒写了一系列反映新中国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的散文、特写。1956年11月,他还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,写成了散文集《心的歌》。

以上,我们对靳以的一生,作了一个简单的描述。从这里,我们看到:哪里有生活,哪里就有他;哪里有工作,哪里就有他。他的一生,不是善

于休息的一生，而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劲、永远在奔跑前进的人的一生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他的散文，就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散文，而是富有他个人性格特色的散文。

中国传统的散文，有的抒情，有的叙事，有的感叹人事的沧桑。但不管怎样，它们都以静观默想的态度，超然于现实生活之外，从而写出一些淡雅优美的作品。这些作品，我们不能否定它们的文学价值，它们在文学史上自有它们的地位。但是，比较起来，靳以所写的不是这样的作品。靳以直接沉入到生活之中，跟着生活一道奔跑、挣扎、叹息，他的作品就在生活的泥土中滚打出来，充满了生活的泥土味和油烟味。解放前是这样，解放后也是这样。不过，由于解放前后生活的截然不同，因此，他解放前后所写的散文，风格也就迥然各异。他的散文创作，明显地可以分成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时期。解放前，作者内心充满了忧郁和悲愤，主要的努力是要揭露旧社会的黑暗，追求光明；而解放后，则是一片阳光，作者放开歌喉，为赞美新时代而歌唱。这样一条从揭

露黑暗到歌颂光明的道路，是中国现代作家所共同走的道路，也是靳以的道路。

解放前，作为中国传统散文经常描写的题材，如像静物和山水等，在靳以的作品中基本上看不到。他关心的是人生现实，是下层人民悲苦的生活。他所写的，多是普通的老百姓，如像人力车夫、渡家、耍戏的、生意人、牧师、女看护、过往的客人等。这些人，生活在生活的底层，无声无息地忍受着生活的重压，一步一步地向前“蹭”。就是通过这样一些人，靳以反映了解放前的黑暗，说明那个时候人们过着怎样屈辱的生活。例如《一人班》，一个七十二岁的小老头子，为了几个糊口的小铜板，整天扑、打、翻、滚在泥土和汗渍之中。又例如《造车的人》，一个一生都在造车的人，为了喂养四个张大的嘴，不得不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造车的“苦命”中。当他举起斧头的时候，“他看不见头上青青的天，堆了洁白的停云的，也听不见水上飘来的悦耳的渔歌；就是有凉爽的风吹了过来，他也是流着汗。”这使我们想起了马克思的话：“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。”“劳动创造了美，却使劳动

者成为畸形。”解放前辛苦的劳动，已经使劳动者失去了生活的乐趣，生活对他们只是一种沉重的负担。靳以真实地描写了解放前普通人的这种悲惨生活，给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一幅幅画卷。

由于时代没有快乐，有的只是悲哀和忧郁，所以悲哀和忧郁，也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。巴金说：“靳以是一个生龙活虎、又直爽、又热情的人。在他身上好像有那么多的精力，那么充实的生命。”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也免不了时代的忧郁感。不仅免不了，而且由于他的精力旺盛，因此，他似乎比旁人更多负担一些忧郁。巴金就说：“那个时候我们的文章里都带了点忧郁的调子，他的忧郁气更浓……我听他那些带着叹息讲出来的故事，我读他的小说《青的花》和《虫蚀》，我为他感到痛苦。”（《他明明还活着》）靳以解放前的作品，就这样充满了忧郁感。《给一个忧郁的孩子》，是这方面的代表作：

夜雨在屋瓦上和檐前响着，潮湿的空气从板壁的隙缝中钻进来，摇曳的烛光被挤得小了，仿佛我又看见你那美丽而忧郁的脸，那